

红

旗

飘

飘



1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

红

旗

飘

飘

☆ 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红旗飘飘 (1 集)

本 社 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8.25 印张 2 插页 185 千字

195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11 次印刷

印数 382,285—392,285 册

定价 11.90 元 (平) 16.90 元 (精)

ISBN 7-5006-1979-0/K · 273

编者的话

几年来，根据广大青年读者的反映，他们迫切需要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读物。

“中国革命胜利以前，中国共产党和许多革命者，不怕杀头，不怕坐牢，他们离乡别井，东奔西走，不计名利，不图享受，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，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，英勇牺牲，艰苦奋斗，前面的人倒下去，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；革命失败了，马上重振旗鼓，继续战斗。”^①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，有着多少可歌可泣，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事迹！但是这一切，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，并不是很熟悉的。因此，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，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，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，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；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。不怕任何艰险，勇于克服困难，无限忠诚于人民的事业。读者的心情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

过去，我们出版过一些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读物，但是，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。我们感到困难的是：熟悉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的作者，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写

^① 引 1957 年 4 月 8 日报社论。

作。同时，写一部较完整的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小说或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，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。这样，就使我们未能更多的出版这类读物。

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，我们除了组织各方面的作者，写作这类读物以外，同时，我们筹办了这个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。

丛刊上所刊载的文章，有长有短，体裁不限。有传记，也有小说，有回忆录，也有一般的记叙文。有描写革命领袖、革命先烈、著名英雄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；也有描写无名英雄及革命斗争中各方面生活的文章。这一集偏重刊登历次革命斗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文章，今后也准备刊登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文章。

创刊伊始，编辑部力所不及之处，定会产生很多缺点，甚至是错误。这就需要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；需要广大作者——领导同志、老革命干部、作家……为本刊撰稿。只有在广大读者和广大作者的支持下，才能使我们这个初生的刊物，逐渐办好。我们热忱地期待着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“红旗飘飘”编辑部

1957年5月

目 次

编 者 的 话	(1)
老共青团员回忆录	
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	张金锡讲 (2)
共青团——我的母亲	温济泽 (11)
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二章 (小说)	
深山苗歌	陈靖、黎白 (18)
云岭雪海	陈靖、黎白 (44)
一个红军的经历 (上)	张友济 (56)
回忆廖仲恺	何香凝 (84)
邓中夏同志在北大	(100)
忆念罗登贤同志	薛 雯 (106)
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	川 岛 (109)
山城的荣哀	
——闻一多先生殉难记	史 靖 (122)
邹子侃舍身救难友	万 正 (141)

女红军张吉兰 梦 岩 (149)

同志·老师·战友

——忆钱毅 陈登科 (156)

桃子又熟了

——忆仓夷 萧 殷 (176)

我的引路人 海 默 (199)

战友徐坦 高 鲁 (219)

红军之母 张 羽 (235)

老共青团员回忆录

编者按：这一集，我们编辑了两篇老共青团员的回忆录，作为向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献礼。

文中所回忆的种种，已成为遥远的往事。当时我们对敌斗争所采取的策略，不完全是正确的，甚至是有错误的。但是前一代革命青年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是永远值得我们景仰与学习的。

当时这些年轻的革命家朝夕向往为之奋斗的理想，今天已经成为现实。但是，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，仍然存在着不少新的困难，这就需要我们年轻的一代，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，把我们的青春献给伟大的、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

这一类文章，本刊今后打算陆续刊载。希望当年的共青团员同志们，能把你们经历过的斗争事迹写出来，交本刊发表。

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

张金锡讲

参加共青团

我是河北蠡县辛兴乡人。1927年，我到城里的高小读书。当时能在学校里念书的，多是一些商人、地主和富农的子弟。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大好，仅能自给自足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当然比不上那些富家子弟。他们常常讥笑我“一脚牛粪一脚泥巴的人，也来念书哩！”我只把他们的话当做耳边风，不理他们。我有时气不过，也只狠狠地瞪他们几眼。我和那些只会贪吃贪玩的地主子弟不同，学习用功，功课比较好，每逢考试，总出不了前五名。在学校里，我最喜欢的有两个老师：一个是地理教员刘宪曾，一个是语文教员宋勃舟。他俩都是共产党员，看见我的出身很好，成绩也不错，又经常参加学校里的一些公益活动，就在那年的寒假里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自从加入了共青团，我的眼睛仿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我的身体里也仿佛增加了一股新的血液。我的斗争生活，就此开始了。

扫除恶霸的威风

我们乡里，有家姓阎的恶霸，弟兄八个，个个像凶神恶煞，为了芝麻大一点小事，都要和人打架，动不动拿出牛耳刀来吓唬人，大家都不敢惹他们。阎家家里还养着几百只羊，每年谷雨后麦苗都长出来了，他们还把羊赶出来放青，糟踏地里的麦苗。

村里的人都恨得牙根发痒，只是没人敢出面和他们讲理。我从前在家里，常常听见村里的父老背地里骂阎家缺德。我年纪很小，知道阎家的霸道，也不敢得罪他们。自从我参加共青团之后，在团的教育下，对革命有了初步认识，对反对恶霸也就有了决心。我把这件事情向团组织一反映，一场反对恶霸、争取群众的斗争就热烈展开了。

1928年春天，我放寒假回家之后，就找了二十几个人来开会。这时，我们学校里有一个人叫张承曾的老师，也从县里来了。他是一个共产党员。我们在会上把阎家的罪行一说，大家看见有人敢出来作主，马上精神起来了，都说：“阎家太欺侮人了，这是骑在人家脖子上撒尿嘛！”也有人说：“打架有我们，怕什么？”开完会，我们心里更有底了，决定等阎家的羊再到麦地去吃麦苗，就跟他们到县里去论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上刮着大风，阎家的羊群又在麦地上啃麦苗了。我们马上集合了三十几个人，各人拿着根棍子，到麦地里去。还没走到那里，就看见一大群羊正在啃麦苗，没有被啃掉的，都给踩坏了，大家马上去找羊倌讲理。这个羊倌姓王名有，住在我家的斜对面，我和他本来就很熟。我对他说：

“王有，你为什么在人家的麦地里放羊？”

“东家又没给我草料，我不把羊赶到这里，你叫我赶到哪里去？”他也是一肚子气。

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这件事全怪姓阎的这个恶霸，不能怪羊倌，决定连夜把羊赶到县里去评理。我和羊倌一说，羊倌挥了一下鞭子，吆喝一声，就和我们一道把羊赶到县里去。

我们几十个人赶着一大群羊，浩浩荡荡到了城里。羊群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里咩咩地叫着，把街上的人都吵醒了，大家都打开门户出来看热闹。我们城里的老师和同学，有不少党团员，

他们当然支持我们。我们的声势更大了。

队伍到了县政府的门前就停了下来。我们派人去把县长请了出来，当着他的面，我从羊群里拉出一头羊来，用铡刀把羊铡死，剖开肚子，只见青绿绿的一肚子的麦苗。一连铡了几只，都是这样。县长见了，没话可说，只得派了几个警察把那个姓阎的找来。等到把那个家伙带到公堂上来，县长当堂判决：今后养羊，决不准随便放出羊圈糟踏庄稼，违者从严处罚。姓阎的那个家伙连连说了几声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吩咐王有把羊赶回家去了。

这件事情，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喜事，阎家的威风，就这样给我们扫掉了。村里的人都说：“咳！小学生倒能办大事情哩！”

组织雇农争工价

我们村里，有一个土地庙，庙前有一块空地。村里的人，有事没事都喜欢到那里去。村里那些雇农和一些做零活的，每天早上都拿着锄头、扁担到土地庙前，等候地主富农来雇用。他们做的活是临时讲的，爱给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能讨价还价。雇工们的工价很低，每天除了东家给的两顿稀饭和窝窝头，只有一毛二分钱，家里的人只好吃糠咽菜了。那时，我们共青团在村里的活动，除了那次反霸斗争，平时只搞一些宣传活动，没做什么具体工作。有的老乡说：“共产党说的倒好听，就是怕成不了什么气候！”我想：要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，光靠嘴讲不成，就决定组织雇工争工价。

有一天，我到土地庙前找了六七个雇工，向他们讲地主老财怎样压低雇工们的工价，还和他们商量好，不加到一毛五不下市。

我们村里，除了姓阎的这家恶霸，还有一个姓董的地主，也是一个刁钻狡猾的家伙。那天，他的管家到土地庙前来雇人，看见那几个雇工都不动，定要加到一毛五才肯下市。他跑回去向姓董的地主一报告，那个刁钻狡猾的家伙偏着脑袋想了想：一毛五才下市？地里的活路又不急，不会去找旁人来干活么？心里打定主意，他就吩咐他的管家另外找人来干活，还叫人到那几个雇工的家里去串门说：“咱们是乡亲里道的，有什么事不好商量？跟共产党走有什么好处？那几个雇工因为没有工做，挣不来钱，家里没有饭吃，又碍于乡亲面子，终于只好下市了。我们第一次组织雇工争工价的斗争，就这样失败了。

这一次失败以后，我们开了个会，总结失败经验，决定分头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，向雇工们讲我们人多力量大的道理，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心，地主老财就要低头，不得不加工价了。同时，我们还决定了最重要的一着：一到麦收，地里的活最忙的时候，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争工价斗争。

我们开完会不久，眼看麦子熟了，财主们争着雇人割麦子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提出收割一天麦子不给五毛钱不下市的口号。当时，为了领导这个斗争，中共蠡县县委的刘魁同志也从城里来了，他是负责宣传工作的。刘魁同志说：“千人一条心，泥土变黄金，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便有力量。”最后他还说：“老乡们，谁要是不涨工价就下市，就是对不起乡亲们了。”

这天早上，董家的管家又大摇大摆到土地庙前来找人干活。雇工们都坐在地上不动，连瞅都没瞅他一眼。那个管家一看苗头不对，找了一个年纪稍大的雇工，低声问：

“割麦子，一毛五一天，管饭。要去就跟我走。”

“一毛五？还不够吃稀饭呢！你没听说不给五毛钱不下市吗？别再罗唆！”旁边一个青年雇工听见，马上顶了他一句。

那个管家碰了一鼻子灰就走了。过了一会，董家的少东家亲自来了。他看见大家都绷着脸不理他，皮笑肉不笑的对一个老头说：“喂，三毛五干不干？”

“三毛五？你到别处去雇吧！咱们得五毛，少一个子儿也不干！”刚才那个说话的青年雇工耳朵最尖，胆子又大，他赶忙替那个老头回答了。

那个地主的儿子气冲冲地走了。到这时候，上哪里去找人呢？麦子早就熟了，一场大雨，烂在地里了，那还得了？转了几下，他又走回来了，问大家四毛钱一天干不干？大家还是不吭声。他只好咬了咬牙，掏五毛钱一天雇人去割麦子。雇工们这才懒洋洋地站起身来，拿着镰刀跟着他走了。

赶走反动校长

1928年夏天，我从蠡县高级小学毕业了。组织上叫我转入县立师范念书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。

当时，县立师范的校长叫张肇宜，是一个反动分子，他和蠡县的县长、警察局长、税务局长穿着连裆裤，是县里四大劣绅之一。这个家伙的私生活非常腐败，养了几个姘头。在学校里面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就甭提有多坏了：学校里的经费、办公费、学费等等，他拿到了手，既不购买图书仪器，又不添置桌椅板凳，都放到他的腰包去了。这且不说，那时，“五四”运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，全国许多学校都教白话文了，我们那个学校，还提倡文言文，叫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，去读什么“孟子”、“文法津梁”。那个顽固校长，还作了一首歪诗来讽刺新诗：“黑云满天，大雨骤下，大一阵小一阵，下得沟满壕平。”他说：“这像什么诗呢？真是狗屁不通！”我们学校里的共青团员们都

挺恨他，决心要把他搞掉。

要把张肇宜这个家伙赶走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！且不说他是一条地头蛇，和反动政府有勾结，就说我们学生们的思想情况，也很混乱。在我们的同学里边，就有三种人：第一种，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共青团员和革命学生，他们一心一意要把这个反动校长撵跑。第二种，是还没有弄清是非的同学，他们关心的只是怎样把书念好，从来不过问校政。这种人在我们学校最多，是中间分子，他们大都是从宋岗小学来的。第三种人，以刘崇书、刘芝堂等人为代表，复古思想最浓厚，他们坚决拥护校长继续掌握校政，还收集情报，向反动校长告密，想利用伪县大队的力量来打击我们。这种人是少数。当时，我是县立师范共青团的宣传委员，我和同志们一商量，大家觉得环境太恶劣了，单靠我们共青团搞是不成的。我们向上级党委请示了一下，党指示我们首先要争取群众，把中间分子争取过来，孤立顽固派，等大多数人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，就一下子把那个顽固校长撵跑。

在我们学校里，有两个群众组织，一个叫“争取自由大同盟”，另一个叫“反帝大同盟”。这两个群众团体里，做工作的多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。我们商量之后，决定通过这两个群众组织来争取同学。我们经常和同学聊天，和他们谈论时事，还送了许多宣传品、小册子给他们。有一位叫刘得汉的同学，是从原来的宋岗小学来的，功课很好，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挺高。我们把他一争取过来，宋岗的同学都站到我们这边来了。

我们的力量比从前强大得多了。请示过上级党委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决定马上把这个顽固透顶的校长赶掉。

在赶走校长的那一天，我们学校热闹极了，满院子都是同学，把校长住的那间房子包围起来了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围成一

个铁桶一般。有一个同学的嗓门挺大，站在前面领着大家呼口号：

“打倒反动校长！”

“反对腐化分子！”

“张肇宜滚出去！”

我们共青团员还到他的宿舍里去撵他。谁知道那个家伙的脸皮挺厚，赖在那里不肯走。有一个姓马的同学胆子挺大，“咚咚咚”地跑到校长的宿舍里，七手八脚把他的行李、书籍都扔到学校门外。那个家伙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再赖下去，便灰溜溜地走了。

以后，这个学校的校长、教员等，除了一两个较好的我们把他留下，其余的都换成了我们的人。到了1930年前后，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成为共青团员了。后来，我们蠡县师范学校给党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，对博蠡两次起义和抗税斗争的作用不小，怪不得有人把蠡县师范叫做“红色的摇篮”。

抗 税 斗 争

我在青年时代所参加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，要算是抗交屠宰税的斗争了。事隔二十多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像是昨天的事情。

当时我们蠡县也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的其他城市一样，捐税多如牛毛，把老百姓的血差不多都抽干了。这里单说屠宰税一项，就征收得非常苛刻，也很不合理。我们县里的屠宰税，县里税务局先把它包给一个姓陈的包商。这家伙，又把北区的税务，转包给我们斗争过的那个姓阎的恶霸。

1930年年底，快要过春节了，家家户户要是日子还能过的，

都杀猪宰羊准备过年。这时，姓阎的又叫人背着一个褡裢，满村满乡的去收一项奇怪的税款：屠宰税。凡是屠宰猪羊的，不管是拿到市场上去卖，也不管是留来自己吃，一律要交税。老乡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气炸了：猪秧是自己出钱买的，肥猪是自己喂的，过年杀了是自己吃的，为什么还要交税？城内西区有些有名望的绅士如何子仁等，也觉得这样还要收税，实在是“于理不合”，对县税务局和姓阎的包商，颇有意见。我们研究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，就决定领导大家进行一次抗税斗争。

1930年12月12日，正是城里市集的日子，我们共青团员全部人马一齐出动，到市集上去宣传，组织抗税斗争。老乡们一听说有人出来抗税，都哄起来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说要到县政府去请愿，誓死不交屠宰税。

这天，各乡的农民听说城里要抗税，都套着大车，骑着牲口，带着窝窝头和烙饼到城内请愿。到了晌午，在城内南门的牲口市上，街道上，集合了一万多人，真是人山人海，把一个小小的牲口市场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我首先在会上讲话：

“老乡们，反动派不叫我们过年了。猪是我们出钱买来的，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；猪秧是我们辛辛苦苦喂大的，又不是政府派人帮我们喂的；过年我们把猪杀了，留给自己吃，又不拿到集上去卖钱，为什么还要收税？杀一口猪要我们六毛钱？我们大家去向县长请愿去！”

当时，大家的情绪非常激愤，到处是“请愿去！请愿去！”“反对苛捐杂税！”“誓死不交屠宰税！”的呼声。接着群众就开始游行。蠡县党的负责人王知远同志在后面指挥，领导这场斗争。

当时，参加游行的人很多，许多本来是来赶集的，都拥进队伍来了，都要到县政府去请愿。这时，满街满巷尽是人流，真

是声势浩大到了极点。请愿队伍到县政府前面，把县府里的人都吓坏了，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，不敢开门。我们派人去把县长“请”出来，要他下令取消屠宰税，否则即捣毁县政府。县长毛丕恩看见我们人多势众，不敢不答应。他说：

“诸位！诸位！咱们是乡亲里道的，有什么事不好商量？我看，这次屠宰税就暂时免征罢。不过，这个税是由省府规定的。要取消，我们得向省府请示请示。”

我们看见目的已经达到，请示了一下党的负责人，决定宣布暂时回乡。队伍还没有解散，有一个老乡问：“要是有人下乡收税怎么办？”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大家就异口同声说：“打死他！”一万多人的游行队伍，就打着得胜鼓分散回乡了。

春节一晃就过了。老百姓的猪肉已经吃到肚里，就是省主席亲自来收税也晚了。姓阎的那个二包商变得灰溜溜的，再也不敢提收屠宰税的事了。

（本刊记者黄伊整理）